

# 人类学的历程与体育研究

胡小明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研究涉及体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通过对人类学的来龙去脉进行全景式的梳理和展现, 分析从体质人类学到文化人类学、欧陆和英美的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走向应用与本土化 3 个人类学发展的视角对体育研究的影响, 并强调了人类学文理融通和脚踏实地的两大特征对当今体育理论探索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体育人类学; 人类学; 体育研究; 理论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 G80-05; Q9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3)03-0007-08

## 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course of anthropology

HU Xiao-m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d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sports anthropology. By reviewing and revealing the wherefrom and whereto of anthropology panoramically, the author analyzed continental, British and American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 from physical anthropology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ir influence on physical education study from such three perspectives of anthropological development as appl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emphasized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such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logy as being equally good at arts and science and being hardhead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ories nowadays.

**Key words:** sport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physical education study; theory and method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带来及时的前沿动态, 极大方便了资料的查阅, 同时也为炮制学术垃圾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手段, 给传统的研究方式带来负面冲击。体育学科是在人类的一个生活应用领域构建的理论知识框架, 在一个未知因素增多、突发事件频发、生活节奏加快、心态相对焦虑浮躁的时代, 人类的体育行为随社会发展浪潮起伏变化, 体育研究更需要避免肤浅化浏览, 甚至随意联想臆断, 跨越其他学科早已迈过了看图识字、空谈概念的初级阶段, 脚踏实地深入到事实第一线进行实证调查, 遵循公认的学术范式进行专心致志的理论思考和创新。因此, 深入实践的人类学方法在体育研究中得到重视, 顺理成章。

体育是文化, 但它是与人类具体的身体运动行为不可分割的文化; 体育学需要哲学, 然而它面向的毕竟是一个更需要看到应用实践效果的领域。立足于中

国的体育研究, 充分占有能准确反映国情和民情的真实材料, 应该成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采用人类学的立体化理论视角, 通过倡导田野调查获得素材的实证方式, 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那么, 问题出现了: 仅仅是利用成熟的人类学来研究体育问题, 还是建立一门新的理论性很强的综合应用学科? 仅仅是照搬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体育领域, 还是加以改良和创新后建立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使之更适用于体育研究? 本文选择后者。

### 1 从体质人类学到文化人类学

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自于人类学, 简要梳理其脉络。这是夯实学科建构基础的首要步骤。

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 起源于希腊文, 是由两个希腊文字组成, 即 anthropos(人)和 logos(学科), 意

收稿日期: 2013-01-20

基金项目: 201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体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ATY001)。

作者简介: 胡小明(1952-), 男,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思是有关研究人类的知识学问<sup>[130]</sup>。众所周知,学科名称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 1501 年德国学者 M·亨德的著作《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不过,此书主要论述的是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sup>[2]</sup>。即今天的体质人类学。其后,斯伯林(Johann Sperling)的《体质人类学》(1688 年)对不同性别、肤色及种族的人体结构展开生物学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此类研究一直持续了两三个世纪。

人类学与体育学一样,在中国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舶来品。20 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势头盖过了已经相当成熟的体质人类学,几乎成为人类学的代名词。到了 21 世纪,后现代思潮对工业社会的深刻检讨以及身体哲学热潮使我们正视身体受到忽略的现实,使体质研究这个人类学出发的原点,在更高层次上重新融入到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并把体质和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新的综合,在应用人类学研究中异军突起。

### 1.1 体质人类学的成熟

体质人类学又称生物人类学,主要研究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类,将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研究其体质形态、身体结构及其生物学的变异和进化,以阐述人类的起源、人种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形成了人体形态学、人类起源学和人种学等基本分支。早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人体测量与解剖。早在 18 世纪,瑞典学者林内于《自然系统》一书中,分出了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目,用“智人”一词表示人类,并把人类分为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4 大种族,首次建立了有关人类起源及其在自然界地位的科学假说。1809 年法国学者拉马克,在《动物哲学》一书中提出生物进化论;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学者达尔文确立了生物进化论,他的《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两部代表性著作,使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自身的起源和进化、演变等问题成了关注的焦点。这时,体育才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文化形态,在工业革命熔炉的熔炼下,在欧洲成形。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对于人种体质特征的研究,集中于对人的发色、发型、眼色、肤色、面部平度、鼻部形态、唇部厚度、头型、身高等外显的体征形态进行测量、分类和研究,大部分属于遗传内容,与后天发展人类运动能力的体育并无直接关系。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1752-1840 年)曾根据人类头盖骨的形态作了人种分类,开现代体质人类学先河,被称为体质人类学创始人。尔后,法国人类学家白洛嘉(又译布洛卡,1824-1880 年)构建了颅骨学和开创至今仍然还在使用的人体骨骼测量方法,发明了几种人类

学测量仪器。他于 1859 年发起并举办了首届国际人类学研讨会,促成巴黎人类学会的建立;1872 年创办人类学杂志,1876 年创建了巴黎人类学院,使人类学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sup>[3]</sup>。随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人类学机构。

进入 19 世纪下半叶以后,大量高级灵长目和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欧洲许多学者注意到考古学的化石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而这些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所以学者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报道。这些情况最初是由探险家、传教士、海员等带到欧洲的,尔后人类学家也亲自到异文化中去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人类学中中止了仅仅关注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传统,而进一步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进化原则的确定,促使原来的人种分类被“谱系表”理论所取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种族学说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为测定种族之间的差异,建立了新的更准确的测量方法,生物测量学在人类学的许多领域中普遍得到应用。今天,当我们已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等视为反映体育最主要的效果时,可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人类学测量方法带来的影响。

当代体质人类学的相关领域包括古人类学、人体测量学、法医人类学、人骨学与营养人类学等。它对人们客观地认识自身,扫除迷信,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改善人们的卫生健康状况,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体质人类学已相当成熟,而随着分子生物学等一系列学科的介入,与医学关系更加密切。

欧洲 17 世纪到 20 世纪的殖民时代,针对所谓“原始人类”的研究,是由殖民地行政机构所监督的有组织的民族志研究计划。这种书斋式的博物学研究,注重由器物着手泛文化比较。后来受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将人类社会理解为自然现象,认为人类社会的活动应该合乎某些生物进化规律,与研究那些地方的动植物一样也可以从经验角度加以观察。这样,对于人类的研究逐渐从体质转向文化。

人类学的研究重心从体质转向文化,在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过程。而在中国,由于引进的时间晚,对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几乎是同时引进、齐头并进的。人类学最初进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人种学”,相对于被翻译为“民种学”的民族学,主要内容是现在

的体质人类学。1903年中国大学生主课中出现“人种及人类学”,1904年清朝《奏定学堂章程》中将“人种学”列为大学课程。对中国体育而言,一个世纪以来在几乎不知人类学为何物的状况下早已习惯使用其人体测量方法。然而,由于开创初期的研究者大多具有体育史的研究背景,体育人类学在北美的诞生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出现的,20世纪末引进东亚,至今多数人仍然仅限于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传统体育。

### 1.2 重心转向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研究并未停留于对人的躯体构造的简单了解,而是希望把握自己的生物性以后,解答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如何影响思考及人类各群体间的互动等根本问题。正如体育的“体”是按自然规律生长对其相对容易了解并达成共识,而体育的“育”是人类的文化行为对其如何实施成为多年争执不休的问题一样,“文化”似乎更有奥秘。

尽管1501年德国学者就开始使用“人类学”一词,但直到1896年泰勒在牛津大学建立了第一个人类学研究室,其研究范围才与现在的人类学较一致。至于“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为美国人W·H·霍尔梅斯于1901年首创<sup>[9]</sup>。此后,北美学者多以“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取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类。泰勒倡导的“跨文化比较”使人类学指向人类社会,整个人类学的重心从体质研究转向以研究各族群文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往往被尊为“文化人类学之父”;但在美国,人们也用“文化人类学之父”来称呼提倡“四大分支”的人类学的博厄斯。而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转变来自英国的马林诺斯基,他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引入人类学,于1930年首创以参与观察法为主的田野调查写成的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依据和基础。

在欧洲的民族学关注于对不同文化的有系统比较研究之时,北美的文化人类学格外强调文化相对性以表达对种族主义的反对,并运用其研究发现来建构文化批判。在博厄斯及其弟子们坚持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倡下,人类学在绝大多数的美国大学和部分英国校园,成为结合多门分支学科的应用性学科门类,也使体育人类学率先受到北美体育史学会的桑斯等一批学者的关注。

### 1.3 分化与辐射

二战以后,许多学科的相互渗透都对人类学产生影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涉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亲属与社会组织、经济政治组织、法律与冲突调解、消费与交换模式、性别关系、世界观、儿童养育与社

会化、语言、族群、宗教、神话、象征、价值、礼节、音乐、营养、休闲、游戏、食物、节庆与体育运动等等。应用性的分支学科及相关领域包括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当代文化研究、媒体人类学与网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等,其跨学科交流的特点日益彰显,学科内部也开始重新交叉融合,但体育人类学的诞生此时并无征兆。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过去所谓的“原始传统部落”的独立和快速的现代化,以原始文化为对象的主流人类学研究开始分化与辐射。在各国政府鼓励下部分人类学者由欧美回到本国,在国内较少数的次文化群体(帮派、同性恋、少数民族的都市社区等)进行研究;部分人类学者开始结合文献与民族志资料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一些仍以部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开始注意原始部落受现代化影响的调适与改变;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关注的部族身体游戏研究,即中国学者所谓的“民族体育”。

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中期,部分人类学家以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为典范,热心于相关族群现代化过程的数理统计;还有些学者,聚焦于社会如何发展与适应于他们的生态区位。教育人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从1954年起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宾德拉为首的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共同进行了8次研讨会;1969年在美国人类学会属下建立了“人类学与教育协会”<sup>[4][43]</sup>。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影响了许多学科发展,包括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与成分分析。美国人类学家科克伦斯(Glynn Cochran)1971年提出作为应用的人类学分支——发展人类学,倡导由精通人类学的政府官员来从事发展计划的研究与推行<sup>[4][45]</sup>。发展人类学对于社区或区域发展的应用研究,是主要针对某一领域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区域体育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途径探索中最为有效。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受到后现代理论影响,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部分研究脱离了这个学科所熟知的实证论传统。在这个转向中,有学者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瓜葛,同时关注权力、性别等议题。文化人类学家重新检讨过去强调科学与量化的田野研究,试图透过对文本的分析,建立起以文化概念为主轴的新历史人类学。有学者回到过去已做过的部落地,用新眼光诠释这些文化。同时,催生了应用人类学的兴起,使包括体育人类学的一大批新兴学科诞生。在英美,关注国际发展的应用人类学演化为发展人类学,而关注国内的研究则仍称为应用人类

学。在影响应用人类学发展的因素中,英国保守党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削减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也促进了人类学走出象牙塔向应用领域的转移<sup>[7]</sup>。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人类学家开始反思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再仅仅关注特定的、原始的异文化,而是寻找当代世界的更多的研究对象,包括全球化、医疗伦理与生物科技、原住民权利、网络虚拟社群,以及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对现代性的批判推动了人类学研究发展和发展人类学。人类学家的学术知识被逐渐接受,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机构纷纷给人类学家设立专门的“社会发展顾问”的岗位,在国际援助纷纷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进程中,除了产生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同时其具体措施对教育、卫生和技术开发等领域都有选择性地改善。这一阶段,是体育人类学开始在北美正式作为学科推出并向东亚传播的初期,其特征是试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原住民的传统身体活动,紧接着几位开拓学科的先驱退休或转行,在文化人类学框架内发展体育人类学的模式凝结固化;后来以日本为主渠道的引进者也秉承北美开拓者的旧有模式,而后续对自身学科理论方法研究的弱化,导致了发展人类学与体育人类学擦肩而过的遗憾。直至今日,我们才在研究实践中屡屡感到当代实施应用理论和方法的缺失。

进入 21 世纪,人类学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变化,学术界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介入,把人类学和发展在理论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中国体育的闪亮崛起以及文化自信心的快速增强,使选择采用人类学探讨体育问题的研究者显著增加,在《体育科学》、《体育学刊》等学术期刊上,相关体育人类学的论文日渐增多。中国的体育人类学正在摆脱引进、借鉴、消化阶段,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同时,也导致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对传统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质疑、调整和创新。

## 2 欧陆和英美的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

### 2.1 学科分支及名称

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在不同学术传统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俄国,“人类学”一词专指对人类生物特性的研究,实际上相当于体质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人类学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有着较为明确的界限。但英、法二国的民族学常与社会学混在一起。日本与中国所承袭的旧传统亦然<sup>[1]</sup>。由于英国的人类学的特殊历史背景,需要对殖民地的传统社会组织 and 原有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加之受法国社会学

派的影响较多,所以英国的人类学比较着重“社会”和“组织”层面。而美国的人类学特别着重“文化”和“人性”层面,所以在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在北美称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在法德等欧陆国家则称为民族学——这个名词由寇拉(Adam František Kollár)于 1783 年所创。

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其研究领域应包括人类的体质、心理、文化、社会、语言、民族、民俗等方面。传统上习惯于将人类学划分为并列的两大部分,即研究人类自身体质特征的体质人类学和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在美国,当代人类学通常划分为 4 大分支:文化人类学(也称为社会人类学并涵盖民族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也往往被包括在文化人类学中)、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这 4 大分支也反映在许多大学的教科书<sup>[6]</sup>,以及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在欧洲的许多大学,这些分支往往安置在不同的院系,且被视为不同的学科<sup>[7]</sup>。如果说在二次大战之前,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还有明显区分,但在战后,英、美人类学家彼此采借概念与方法论取向,开始将这两个传统合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也有许多人类学家并不赞同美国人类学的“四大分支整体论”,但 4 大分支论已在美国的学术影响力之下,向国际间输出<sup>[8]</sup>。

我国 20 世纪初主要由在欧洲留学的学者,接受欧陆的学术传统教育后引进民族学;后来,也有些留学英、美等国的学者采用广义人类学观点,但未占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的狭义人类学观点,在 30 多年里把人类学等同于体质人类学。例如复旦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即设在生物系,专门从事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人类学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等等。近年来,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还涉及灵长类的解剖和生态、人类生理特征的遗传与变异、各少数民族正常肤纹、各种遗传病患者的肤纹、各民族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近年来,分子生物学被用于人类群体的亲缘关系、进化和迁徙等研究。此外,人类工效学、法医人类学、古病理学和医学人类学等与体质人类学关系密切的应用学科,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我国学术界,两种人类学的含义都有人采用。中国内地有学者专门就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概念问题进行厘清<sup>[9]</sup>。有的人类学研究者则更趋向于人类学特指甚至等同于文化人类学,并与民族学相关联<sup>[10]</sup>。无论学科怎样划分,人类学的主题都是遍及整个地球和贯穿

整个历史的所有人类,需要了解人的躯体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就中国体育研究者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10多年,大多是借用民族学来研究民族体育活动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转换到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进入21世纪,则是寻求学科自身理论方法的转折时期。

## 2.2 在后现代进程中交融

20世纪后期,科技进步已刺激人类学各个分支的方法论创新。如碳元素定年法、群体遗传学、GPS、数码摄影与录音等技术的介入,使人类学成为一个具有多样化的方法论的学科。不过,根植于实地田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仍然具有核心地位,并由渗入的各种新兴技术手段来强化科学性并提高效率。

进入21世纪,有部分人类学的次领域跨越了传统分支。例如,医疗人类学往往被视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然而,有许多研究医疗议题的人类学家也探讨群体中的生物变异,或是文化与生物的互动。他们也可能采用语言分析,以了解围绕在卫生与疾病议题的沟通,或是运用考古学技术,以了解历史时代或史前时代人群的卫生与疾病。环境人类学或生态人类学是逐渐成长的次领域,关注人类及其环境的关系,结合文化人类学与生物人类学,从环境影响、野生动植物保育或栖息地保护,到传统生态知识与行为。在北美一些大学,人类学家的专业方向可以联接到民俗学、博物馆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社会关系、族群研究、文化研究与社会工作。体育人类学的出现就是一群对游戏研究感兴趣的体育史教师合作的结果。

在欧洲,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仍然具有紧密关系,被称为“民族学”的研究资源大多归博物馆。如法国的大多数人类学研究都在国家资助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而不是在大学科系。李维史陀等学者在各地建立研究中心与研究室,推动了法国人类学的制度化,并与美、英人类学家加强联系。社会理论家布迪厄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主题同时包括社会学与人类学。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继续强调社会组织与经济,并采用了各国的其他社会理论。在英联邦国家,社会人类学往往在学院制度上与连结到生物学或动物学系的体质人类学及灵长类学区分开来;也与连结到古典学、埃及学等科系的考古学区分开来。

体育人类学是20世纪末形成的一门稚嫩的新兴学科,在采借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时,首先以成熟的主流经典方法为基础,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新观点、新方法小心翼翼加以辨别和分析,把形成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学科构建的基础。由于体育人类学的诞生地是美国,迄今为止主要按北美学术传统采借

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划分,因此,有必要在这门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重点分析人类学独特的经典研究方法。

## 2.3 经典研究方法

早期人类学研究者多采用欧洲的民族学方法,如摩尔根对于宗教、政府、物质文化、特别是亲属模式的比较分析,主张人类的各个社会可依据一套进步程度的量表,而被归类到各个文化演化类别之中,范围从“蒙昧”、“野蛮”到“文明”。摩尔根运用技术(例如弓箭制作或陶器)作为各文化在这个量表上的地位指标,这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一批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体育界对民族传统体育采用民族学理论指导和文史资料搜集的方法,进入挖掘整理的初级阶段,经历了十余年的挖掘整理积累了大量基础性资料,但在理论建树上乏善可陈。

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人类学研究由于有大量原住民作为本土资源以完成民族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其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旗帜人物是博厄斯,他主张世界维系各种独特的文化,而不是依其文明程度多寡来测量其演化程度,其研究取向是实证的。他对于过度归纳抱持怀疑,而且不轻易建立普遍法则,他反对传统的进化论观点,在相当长时期在中国大陆受到批判。博厄斯学派的成果取得,来自于人类学成熟的传统研究方法——田野工作。这也是近年来在中国的体育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借鉴的人类学特有的传统方法。

田野工作(fieldwork)又称田野调查,即在研究者亲身前往实地的调查研究中,集中于某一地点或区域长期居住,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与当地人民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交换活动、地方政治和宗教仪式等。田野工作在人类学的应用典范,是20世纪初英国的马林诺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把田野工作方法加以规范,使其提高到被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新水平。

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和文化理论建构,是马林诺斯基对人类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提出了“整体性田野工作法”,成为公认的人类学最基本的3项学科规训。马林诺斯基在太平洋岛屿进行调查,共达4年之久,首倡参与观察法,即主张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应在所调查地区长期居留,学习当地语言,完全投入当地人民社会生活中去,才能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自马氏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者,都意识到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民族志,建构相关理论。而想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校撰写论文,并通过答辩才

能取得资格认证。参与田野工作几乎被视为人类学家的成人礼。

田野工作成为人类学家的常规研究方法,而取代坐在书斋里或在图书馆里的“圈椅人类学家”的古典人类学研究方法——只搜集前人经若干世纪积累的民族学资料(类似中国体育界研究民族体育的方式)。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带领下,许多人类学家以自身实践丰富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规范。北美人类学家则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将美国人类学的新鲜活力注入现代人类学,并与英国社会人类学会通。英美人类学的现代人类学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改进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如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中国的吴文藻等人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变革迅速跟进,各有成就。一些最初研究社会学的中国学者也开始认真学习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不满足于仅仅调查真实材料,他们做田野工作和撰写民族志,并不停留于对人类文化的原始资料的铺陈和做些“百科全书式”描述,他们的目标是建构文化理论,用来解释和说明文化行为。人类学形成的以田野工作为轴心的一整套独特的研究方法,为其他学科广为借鉴。而体育界就是在这种应用的需求下积极接受了人类学的进入。

### 3 走向应用与本土化

二战后,人类学的海外田野工作受到极大冲击,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规划以及所谓全球化的浪潮正深刻改变人类学家关注的传统田野面貌,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人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田野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也相应调整自身的适应性,一方面反思与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和弊端,倡导文化相对论和多元主义,树立自己保护弱小民族文化的形象;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田野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技术方法。进入各国外交正常化的和平时代,西方人类学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进入非西方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伴随大批本土人类学家的成长而更多走向应用于改善自身文化的进程。体育人类学在美国率先竖起旗帜,东亚各国引进后迅速把研究视角聚焦到本土化的应用领域。

#### 3.1 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应用人类学并不是人类学传统4大分支意义下的另一个分支,而是人类学走向应用的趋势,并伴随着大批如体育人类学这样的分支学科的出现。两个多世纪以前,康德<sup>[1]</sup>花费25年来撰写他探讨人类学的重要专著《实用人类学》,“从一个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然

而,这虽然是他亲手整理的最后一本书,但“实用”的内容既不涉及体质也非文化,只是将人类学当成他的主要学科——哲学的辅助领域。因此,这本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应用人类学,与体育研究也无甚干系。

应用人类学作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趋势,致力于把人类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运用于改变人类社会生活不如意的地方,以促进人类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时,它也从事相关的应用理论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中,应用人类学发展最为迅速。因为有了人类学应用的大量实践,归纳概括这种实践的名称也应运而生。1896年,人类学家布林顿(D Brinton)在就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时,发表了题为“人类学的目标”的演讲,首次使用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一词来指称人类学的应用实践。虽然此后还出现过其他名称,如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行动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action)、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人类工程学(anthropological engineering)、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等等,但“应用人类学”这一名称由于具有较广的涵盖面和概括性而被人类学界普遍接受,成为限定和指称人类学应用实践与研究的专有名称。在西方,目前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参与社会规划与决策,处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改善现存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卫生等条件,促成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并使人类学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想付诸于具体的行动与实践<sup>[2]</sup>。

人类学由许多不同的源头发展而来,包括化石收集、探查、纪录片拍摄、古生物学、灵长目学、文物维护与博物馆研究、文字学、语源学、遗传学、区域分析、民族学、历史学、哲学与宗教研究等,因此它涉足更多的领域是必然趋势。可以这样认为,有关人类的一切领域,都可能引起人类学家的兴趣。由于封闭的社区样本日渐稀少,当代人类学把目光投向族群全球化、公共文化、性别、都市等领域,在分支中寻找“田野”。体育人类学作为新兴的应用性分支,从研究体育本元问题出发,仍然可以深入到保持原始身体文化形态较好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统的田野调查,研究领域上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早期人类学主要研究简单社会中的原始族群和“异文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本土人类学者的成长,研究对象由异邦转为本土,由异文化转为本土文化,由原始村落转为现代化都市,为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空间。不过,即便一部分应用研究转为更复杂社会——包括主流民族的文化,还有相当一部分仍然把少数民族视为研究的重点。作为很稚嫩的应用



型分支——体育人类学，在传入之初就开始了本土化的尝试，主要的研究对象依然是传统的对本地区原住民传统体育的研究，对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可以说也尚在起步展开的阶段。

### 3.2 人类学传入中国后的快速本土化

人类学最初由严复等人翻译有关著作而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00年清朝政府颁布《大学学制及其学科》，设有《人类及人种学》课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学科也设有此课程。1904年，梁启超曾在他所办的《新民晚报》刊登《中国人种学考》。1916年，孙学悟在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发表“人类学之概略”一文，正式使用“人类学”一词。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出版。该书包括人种的特征分类、分布，人类的起源、进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内容。1924年出版了顾寿白的《人类学大意》。该书包括人类概说、人类性质、人类由来、人种分类法与差别、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内容。192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1卷第12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1917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了兼容并包主义，推进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新学问的建立和发展。以后他又负责筹备中华民国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人类学研究组，许多人受到影响到国外攻读人类学专业。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体质人类学到文化人类学的重心转移过程十分迅速，20世纪30年代以后形成偏重于文化人类学的局面，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较少；而且，相对于文化人类学而言，对体质人类学的了解及研究，也要比西方晚很多。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外籍学者在中国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带动一些中国人参与并受到锻炼。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以北京协和为基地成长起来，吴定良、李济、刘咸等体质人类学家开展了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创编了中国人类学杂志。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发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是中国人类学北京协和学派、成都华西学派的萌芽和成长时期。华西大学是由美、英、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1905年联合在成都创办的一所普通高等学校。1910年招生，当时学校就注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教育。如哲学系、西洋史学系均设有“人类及人种学”课程。而理科的生物学系亦设有“人种与人类学”课程<sup>[3]</sup>。华西学派的葛维汉受美国人类学者博厄斯影响甚深，可视其为历史学派的学者。不过，当时更多

的学者接受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和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

人类学早期本土化最明显的领域主要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领军人物是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学科本土化过程可以看作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进入的一种应对方式，当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学到这些学科的知识之后，一种深埋内心的对于母文化的感情使其选择做出了对于这些外来学科进行改革的尝试，作为第一代在海外学习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留学归国的吴文藻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sup>[4]</sup>。他和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为代表的学术群体，讲理论，重应用，在实践中将“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结合，努力探索学科的中国化，树立了从异文化研究转向本文化研究的范例。吴文藻于1929年留美回国后，致力于文化人类学的教学，用中国文献和民族学材料进行讲授，主张人类学应从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中国人类学应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提出要使中国式的人类学社会学“植根中国土壤之上”，“彻底中国化”。他经过研究分析后认为，为应用人类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功能学派理论，最适于用来研究中国国情<sup>[5]</sup>。后来，由于炮火连天的战乱和意识形态的冷战，人类学在神州大地上销声匿迹了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期间，体育作为一种教育改革举措尚致力于从英、德到日本模式向美式转换，其间虽有“兵操废存之争”、“土洋体育之争”等波澜，但并无展现学科层面的全球化理论视野。

可以说，人类学自传入中国伊始，就走向了本土化的应用之路。那么，体育人类学的本土化，不过是几十年后步其后尘而已。

### 3.3 新时期的发展

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文化人类学在中国逐渐复苏，多所大学新设或重建了人类学系，成为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人类学系，1981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同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99年云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至90年代初，中国体育界也为接纳人类学的进入做好了充分准备。

重新复苏的文化人类学在改革开放之前受到了压制，而归属自然科学领域的体质人类学及考古学具有长期稳定的学科发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各省文管会、博物馆等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人类研究的主要力量。也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如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也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教学或研究。1982年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改名为人

类学系。1999年台湾慈济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从事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另外,各医学院校人体解剖学和公共卫生学方面的学者也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引进体质人类学以来的研究对象一直主要就是中国人自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技术向微观和分子水平发展,在古人类学、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以及相关的应用学科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体育界虽然借鉴了人体测量与评价等方法,牵头进行了国民体质监测、青少年体质调查等活动,但与体质人类学并没有太多交流。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趋势日益明显。“应用人类学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文化是不断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前提下,把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社会的认识 and 知识应用于改善人类社会文化现状和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学科<sup>[6]</sup>”。西方的人文社会学科有自己的生长土壤和服务对象,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照搬,否则就会成为一堆脱离中国国情的空洞理论。体育人类学的引进和消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从民族学、历史学转轨的漫长过程,21世纪向更加务实的发展人类学中汲取营养。

人类学进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进程,可以为当前的体育研究带来很多启迪。当一门面向实践的西方应用学科传入以后,研究者不应迷恋于过分抽象的纯基础理论研究,否则可能耗费毕生精力最终结果是水中捞月。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有太多的专家教授投身于体育概念的研究,至今热度不减;2013年第2期《体育学刊》有一篇检索体育概念来源的文章写得很好,颠覆了教科书和一大群所谓权威们几十年来语焉不详的瞎猜<sup>[7]</sup>。我们出国机会少,外语水平不高,奢谈几百年前在几千公里以外出现的体育概念,就像外国人分析太极拳动作一样,没有意识到最终可能把自己降低到看图识字似的自我琢磨仍不知所云的幼稚园水准。

中国的体育人类学面临新世纪的到来,毫不犹豫地脚踏前辈学者的足迹进入本土化的路径,从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华民族体育入手,避免把中国的材料仅仅作为西方理论的注脚,积极探索自己学科应有的理论和方法,在以身体运动为基础的实证和分析中对体育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进行自主性理论创新,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开拓更加有利的空间。

## 参考文献:

- [1] 吴泽霖. 人类学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
- [2] Dieserud Juul.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the science of anthropology[M]. Lond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ISBN 0-8021-3943-4, 1908.
- [3] 埃尔曼·R·瑟维斯. 人类学百年争论: 1860—1960[M]. 贺志雄等, 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 [4] 陈国强. 文化人类学词典[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 [5] 刘晓茜, 李小云. 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概述[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1(5): 38-47.
- [6] Kottak. Conrad Anthropology[G]//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8.
- [7] Layton, Robe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 anthrop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8] Segal, Daniel A, Sylvia J Yanagisako James Clifford, et al. Unwrapping the sacred bundle: reflections on the disciplining of anthropology[M]. De Salem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 何星亮. 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J]. 民族研究, 2006(5): 41-50.
- [10] 王铭铭. 人类学讲义稿[M]. 上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 [11] 康德. 实用人类学[M]. 邓晓芒,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2] 董建辉, 石奕龙. 西方应用人类学百年发展回顾[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5): 82-88.
- [13]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6)[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 13-14.
- [14] 孟航.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165.
- [15] 蔡元培全集: 第6卷[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8: 421-422.
- [16] 石奕龙. 中国应用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J]. 云南社会科学, 1994(6): 25-30.
- [17] 郭红卫. Physical Education 和 Education Physique 出现的时间考[J]. 体育学刊, 2013, 20(2): 20-23.